

■玉渊杂谭

大学校园的围墙在哪儿

文·杨雪

长久以来,有关大学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讨论似乎一直没得出令各方都心服口服的结论。所以,大学正常教学秩序与国民参观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生些事端。这不,中山大学某教授和校保卫处就因“能不能进入草坪上课”的问题“互撕”上了。

教授有理,认为大学校园里的高雅,正在于随处可见坐在树下读书的学生,围坐在草地上上课、讨论问题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倚偎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的情侣……但校保卫处也显得委屈,吐槽常有

老人、孩子和推着婴儿车的人群在草坪上晒太阳,人走之后,草地上一片垃圾……

不可否认,从过去到现在,开放的校园确实对大学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拥有堪比园林美景的北大、武大、厦大等,常年受到游客“骚扰”,尤其是樱花季的武大,无论对学生、学校还是游客而言都是灾难。又比如校园道路上有很多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学生,也就往往成为机动车事故多发地段。总之,似有种种苦衷,许多大学降低了开放度,用各种限制手段代替管理。

然而,以堵代疏从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下策,在大学之开放性问题上,更属下下策。例如厦大对“游客”限流,马上就出现各种神通广大的“黄牛”,收费带人抄小路、翻墙进入校园。再回到上述中山大学的例子,限制所有人进入草坪,却将该享有优雅环境的师生也一并拒之“草”外。对存在的问题不加以深究,拿不出科学的精细化管理方案,依赖这种“一限”之的模式,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徒增一些新麻烦。

实在不想在此多费口舌去举牛津剑桥等例子,没有围墙的大学早已是国际惯例。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是如织,却丝毫不破坏学府的醇厚和庄重。再看我们因围墙而封闭的大学,围墙似乎又起不到封闭作用。找到徘徊在厦大周边的“黄牛”,就能带你逾墙而入。针对此事,某专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光看标题就来的一针见血、酸爽痛快——《花20块钱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

进门观光只不过体现了大学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初级水平。实际上,图书馆、体育场、食堂等公共设施都应有条件地向公众开放,尤其是图书馆。记得读研究生时做新闻史作业,去北大图书馆查阅民国国

报资料,小心翻看发黄的新闻纸,一种对学问的敬畏感油然而生。而这些旧报刊原件,国家图书馆或许都是没有的。

正是个体发自内心的敬畏感,弥漫在大学四周的空气中,才能凝聚为一种精神围墙。这堵墙围住的是对良知底线的恪守,对独立人格的修养,对学问真理的追寻。至于大学里面的古籍、古树、古建筑等,恰是面向公众,涵养敬畏感的资源。打开有形的墙,浇筑无形的墙,方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当然,过程一定会有些“凌乱”,但也真正考验管理智慧。

日照不知不觉地长了,就连午后的楼影也跟着变长。没有雪的冬天,日子被暖阳融成了白云苍狗,转眼之间,元旦已近。

元旦古称元日、元正、元长、元辰、元辰、元春、端日、上日等,最早出现于《晋书》:“顺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在我国最早记载元旦的是南朝梁人萧子云,其在《而雅》中写道:“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万象更新,岁首清明与元旦有着不解之缘。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新年。”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元旦,是指农历正月初一,即现在的春节,而不是公历的1月1日。

站在春头的元旦

文·秦延安

元旦是新年,也是春节,但在中国更看重的则是春节,而元旦则被经常忽略或淡忘了。

“元”是第一或开始的意思,“旦”字上面是个日字,下面是象征大地的一字,意思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元旦”二字合在一起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国外很多国家都将元旦称作“新年”。虽然元旦和春节都有新年的意味,但在中国更看重的则是春节,而元旦则被经常忽略或淡忘了。

虽然元旦之日少了喜庆气氛,但这并不影响元旦在“行夏正,顺农时,便统计”中的作用,它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悦。

青蛙钻入泥穴,把体温降到冰点,回家;蝴蝶闭锁翅膀,囚禁起所有色彩,回家。元旦,便是春节的预演,回家的倒计时,让辛苦在外奔波一年的游子,不由然的想起远方的家,便筹划着无论再苦再难,都要回家过年。

有开始便有终结。元旦即是一年的终结,又是一年新的开始,去与来就在这时光的轨道上穿梭着。这种轮回交替不仅潜藏在人们的心里,更是蛰居在唐诗宋词中。“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在《田家元日》中,告别斗转星移的孟浩然,在元旦看到的是和煦的春天,寒冷的告别预示着温暖的回归。“桃随人换,梅花隔岁香。”而在《岁旦》中,宋朝诗人宋伯仁看着因人而换的春联,嗅到的却是隔年的梅香。时光的潮水总是无情地将一拨又一拨的人从此岸送到了彼岸,在辞旧迎新中让回忆装满了芳香。

流转的时光可以改变曾经的容颜,可以碾碎古老的习俗,却改变不了人们对希望的祈盼。虽然元旦已不再是昔日的元旦,但人们对希望的追求却从未减少。

站在岁末的尽头,回首一年的枝枝叶叶,有喜有悲,有烦有恼,有完成的目标,也有没实现的愿望,一年的光阴在元旦中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生的追求却还在路上。

走完了一岁的光阴,却难得走完一生的路程。大街上依旧车来车往,天桥上人流从未停息,对面对面的一座座钟已经停止摆动,也许它想留住这美好的时光,但时光的脚步何人又能留住?太阳爬过楼顶,窗棂把阳光牵进屋,就连阴暗的屋角也出现光亮。我的心若满腹溪水,明心见性,汨汨涌动。

元旦站在春头,希望是满满的,一切都将再次出发。

文·魏邦良

馅子都是干材料,过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紧的,到宿店的时候,一点火,袋里掏出一个‘国宝’在火上烘烤一会,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至于宿费,每夜只需大钱二十一文,由徽州走到杭州,二百文川资,绰有裕。徽州人穷得不能聊生的时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号,说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徽州人因为有这样‘国宝’,所以能走遍天下,而无一点困难,徽州朝奉的足迹遍国内,是不能不感谢这个‘国宝’的。”

“不要慌,十天到余杭”,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徽州面饼是物质上的“宝”,这种乐观主义则是精神的“宝”。怀揣双宝,徽州人自能走遍天下。

这些经过千锤百炼流传下来的凝聚着先辈智慧的徽州民俗,蕴含着徽州人特有的徽州精神:独立、乐观、重教。

这种精神是徽州人,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笔财富。

■吾心吾性

于俗谚中见徽州精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往往深藏在那些虽经岁月淘洗却依旧熠熠闪光的俗谚中。

徽州人提倡独立,强调自己事自己做。俗语“徽州朝奉,自己保重”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胡适儿子胡祖望在外地读书,胡适就去信提醒他要记得“徽州朝奉,自己保重”:“……自己能照应自己,服侍自己,这

是独立的生活。饮食要自己照管,冷暖要自己知道。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功课做的好,是你自己的光荣;你做错了事,学堂记你的过,惩罚你,是你自己的羞耻。做的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你是徽州人,要记得‘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胡适一直到晚年都坚持“自己帮助自己做事情”。在他看来,一个男人不仅要能干一番事业,个人生活也不能完全依赖他人。他认为,一个事事依赖他人的人,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废人了。

徽州的另一句俗语“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强调的依旧是独立的重要性。

胡适曾对秘书解释了这句土话:“从前出门的网篮,网坏了,绳断了,轿杠断了,扁担断了,都得用着绳。必要时还可以用绳上吊。”

这句话,显示了徽州人的独立意识,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求人。

有人用“前世不修,丢在徽州”来形容徽州地理环境的恶劣,然而,这里的穷山沟却飞出了一只只金凤凰。这是因为徽州人重视教育,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徽州的两句俗谚:“三岁定八十”,“山树条,从小弯”,表明了这一点。

胡适认为,家庭是训练一个人学会做人的重要场所,所以家教特别重要。事实上,胡适成为一代大儒与其母早年对他“高标准,严要求”密切相关。

徽州山多地少,但徽州人人生性乐观,敢于闯荡。陷入困境,他们总以“不要慌,十天到余杭”来安慰、激励自己。因为只要到了杭州,肯吃苦、善经营的徽州人总能凭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谋到饭碗,开创事业。

一次,苏雪林去拜访胡适。苏雪林去

时,胡适正在用早餐:一杯加了咖啡的牛乳,一盘切开的烤面饼。胡适一边吃,一边告诉苏雪林,这面饼是徽州点心。他对苏雪林说:“这烤面饼是面做的,馅子是香椿、萝卜干,不易霉坏的材料,这是我们徽州人的‘国宝’。我们徽州人在商业上的成功,都要归功于这‘国宝’。”

见苏雪林面露疑惑的表情,胡适拈起一块面饼,继续说:

“我们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国的出产都是很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于是居人不得不冒险到外边去谋生之道了。我们徽州人的习惯,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把一个留家里耕种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十三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只用几尺蓝老布做成一个袋,两端缝合,中间开一个口,每袋一端,装进五个这样的‘国宝’就算孩子长途的粮食了。好在这‘国宝’的

学徒、学兵与学匪

文·籍利平

电影《师父》提供了一个匪气浓浓的师父们合伙算计学徒的惨烈标本。学徒通过3年苦学,凭借真本事踢了八家武馆(难度不亚于发表八篇SCI),还是被兵、匪夹击而亡。

宁死也不离开天津,其实是学徒对于理想的守候。这一点上,他的确超越了自己的师父。虽然师父武功高强,但为人确实比徒弟猥琐了许多倍。正如师父所言,徒弟学武的出发点也许不是那么纯洁,可是一旦学进去了,心里就只有武术了。这一点上,他比那一大群吃老本、甚至没有老本也要吃、要耍阴谋的师父们干净了许多倍。

有趣的联想是,如果土匪一样的师父,真的带领学徒发表了8篇SCI(屈尊为第二作者);如果学徒日后也成了师父,那么学界(武林)将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领袖”呢?

将雯丽扮演的女“师父”,是另一个标本。丈夫的英年早逝,让这个也想吃武术这口饭的变态女子和男人斗起来也不择手

段,心狠手辣。如果不是廖凡所扮演的师父,只想教点真东西,不想大开杀戒,那么狭路相逢的胡同里躺倒的肯定还会增加一个。

女土匪头,发起狠来,能量超过了学徒和学兵。尽管不是靠真本事,靠的是阴谋和算计。

有时候,逃离一个圈子未必是坏事,也许是一种成就呢。廖凡扮演的师父,十年后如果重新返回“天津”这个圈子,那些在胡同里让他指点过的“徒弟们”会不会已经集合起来,切磋“咏春拳”技术了呢?很有可能。如果是那样,师父就没有白动刀子。

凭借徒弟的浴血打拼,挣下自己名头的师父们,会不会问心有愧?是否心安理得?如果一点惭愧也没有,那可就缺失了人性。那样的大名鼎鼎的师父,不当也罢!

“名为学者,实为学匪”的师父们有多少?幸亏,学者本身还不是一种职称,尽管添加了千奇百怪的形容词后,可以成为“弯腰瞩目的唐僧肉”。

由“师父”升级为“大师”的又有多少?



■艺苑

冬日脚步(摄影)

刘维芳

■写在书边

真正的尊重是身受感同

文·肖蕊



年幼时无知,曾认为摄影和写作一样,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动,因为门槛低所以显得攀登不难。以前不懂,觉得只要认字都可以写作,都会写作,不比美术、音乐、或者舞蹈,称不上是一种技能或长处。摄影也是如此,只要手上拿着相机谁不会按快门呢?直到有了自己的相机,结交了以摄影为业的朋友,才明白自己的浅薄。现在我懂非懂,

我们欣赏摄影作品不仅关注美与丑,也有善与恶、是与非、真与假,还有“为什么”。

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吕楠。同样是经年累月混迹在社会底层,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用镜头观察、记录人群。吕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恢宏如史诗般的“三部曲”。和马宏杰一样,他们都是苦行僧。身上背负的不是宗教教义,而是不能回避的内心。有人把摄影作为工具,有人将摄影当成娱乐,也有人以此信仰。我还想起李京红,他和章桦等人共同生活四年,用摄像机记录她们的发廊生活。后来章桦误打误撞也成了纪录片工作者。他们这些人,好像是社会的第三只眼睛,人们在报章杂志、电视新闻上看不到的,看到了也看不清的,他们呈现出来了。

马宏杰的文字朴实无华,平铺直叙,没有矫揉造作。我想,他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头有大石,写下了也许能轻松一点吧,在这个人迫不及待发表言论的环境里,这种只记录、不评论的做法已经很少见了。他呈现真实,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而不是用评价来左右我们的印象。

耍猴人本不该是耍猴人,就像猴子本不该被耍。在中国,财富和职业能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旅途中,马宏杰不被人理解——“你一个记者,怎么和这些社会盲流混在一起……”这样的不理解源于对耍猴人的轻视,他们无数次被驱赶、被咒骂、被殴打。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里说,所谓的偏见,就是把一个人的一个部分,当成他的全部。马宏杰没有这样的偏见,和他们一起扒火车,同吃同住,风餐露宿,真正的尊重便是身受感同。

我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入手去评价这本书,只感到七情从四面八方将我包围。看耍猴人讨生活,是苦涩;看人与猴的亲昵相处,是温暖;看耍猴的收入不错,是喜悦;看耍猴人被刁难,是同情;看耍猴人被诈骗,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看掌握权力的人仗势欺人,是愤怒;看耍猴人抱着猴子尸体痛哭,是绝望……然而最刺痛我的,是无力感。没有救世主,你哭或者笑,都无法对这一切有任何改变。

我敬佩这些耍猴人,他们坚强勇敢,在糟糕的环境下,从不抱怨,安分守己。坚守

原则与道义,绝不乞讨,绝不偷盗。他们视猴子为亲人,吃饭让猴子先吃,猴子走累了便放肩上。生活困苦,已让他们不会驻足眷恋眼前美景,却在路过的时候,专心欣赏。他们是可怜的,但怜悯是最廉价无耻的感情,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会日渐散去直至消失不见。马宏杰始终平视他们,用心在关注,而非出于肤浅的怜悯。尽管他早已与耍猴人命途相连,也并没有刻意美化这一群体。在他的笔下,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他们在驯化猴子时“以恶治恶”,用鞭子说话;不是他们,猴子也不用在寒冷或酷暑天气卖力表演;他们收买被拐卖妇女,罔顾法律,很多时候表现出无知、懦弱、执拗,甚至愚蠢……

CCTV有个叫《纪事》的长纪录片栏目。(张家铺子)那期,令我印象深刻。影片中,一对老夫妇开了一个卖手工编织器具的店铺,不是什么精美的艺术品,只是普通人家会用到的簸箕、竹筐、竹篓之类的工具。家人记录了铺子几十年来的变迁,最后因为人们摒弃了陈旧古老的生活方式,这门手艺不再受到重视甚至显得多余,

张家铺子逐渐衰落,面临开张。纪录片的尾声是两位老人坐在自家店铺门口凝神发呆。不知道节目组跟拍了多久,片子的节奏像流水一般平淡无奇,却又让人感到台风来临之前那种沉闷,《最后的耍猴人》也是如此。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寻常的事物也被镀上了厚重的光泽,事件仰赖记录的人而成为历史。

像猴戏一样,很多民间传统技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下,变成浪花再也激不起波澜。推陈出新当然是好的趋势。当历史条件不复存在,耍猴不能再维持生计,这种无论对人还是猴来说都艰辛的生活方式会被淘汰,既是无奈之举也是自然而然。农闲时流窜卖艺的传统耍猴正从社会生活中淡出,但猴戏养殖、驯化、表演一体化,驯化师培训、驻场等新形式正在兴起。所以,不论是耍猴人还是作者,对这项技艺的消亡并不遗憾,甚至有点期望,读者也希望耍猴人不再颠沛流离。书名叫《最后的耍猴人》,不是让人们去追思去缅怀,而是如自序所说,它只是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记录成长。

